

城 人物简介

迟福林,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,海南省社科联主席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。2002 年被中组部等四部委授予“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”。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的客座或特聘教授。全国政协第十一、十二届委员。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,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。

城 人物印象

三十多年来,迟福林发表和出版了 500 多篇论文、20 多本中英文专著、一百多份政策建议报告。他还是个“获奖大户”：“全国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孙冶方经济学奖、中国发展研究奖、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、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、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、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等,几乎中国经济学、社会科学的重要学术奖项都有他的份。2009 年,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遴选出“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”,迟福林名列其中。



迟福林认为要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转型战略:尽快走向消费主导

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

深灰色西服,红色领带,两鬓有些许斑白,语调和步履都透着沉稳,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均一一耐心回答——这是岁末年初先后被“《财经》年会 2014:预测与战略”及和讯网“财经中国年会”请上北京讲坛,就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发表最新见解的迟福林院长给记

者留下的印象。

1988 年春天,37 岁的迟福林离开中央部委南下海南,从此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。但他的学术目光并没有囿于这个海岛,二十多年间,他的身影一直活跃在京城经济学界的讲坛上、重大活动中。

建设消费型社会须提高百姓收入

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,中国经济进入了亟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新阶段,加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,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为广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问题。

对此,迟福林在和讯网的论坛上提出,“13 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最大的增长优势”,“初步估算一下,到 2020 年,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将达到 45 到 50 万亿,也有人说能够达到 50 到 60 万亿,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将使我国到 2020 年的内需总规模达到上百万亿,这将为未来 7 年 7%左右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。”

但他同时强调,有增长潜力并不表明会转化为现实的增长优势,关键是要通过市场化改

革释放内需潜力。他认为,有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尽快突破:争取一到两年内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说了算;两到三年内垄断行业的改革有重大突破,实现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,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,使民营经济成为增长的主力军、生力军;未来一到两年,在金融、石油、电力、铁路、电信、资源开发、公共事业等领域,应当向社会资本推出一些重要的项目。他说,突破这些改革的重点,才能释放全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力,才能保障增长的潜力。

多年来,“建设消费型的社会”、促进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,一直是迟福林研究的一

个重点。他曾主持海南“中改院”完成了《消费主导——中国转型大战略》的研究报告,这个报告提出,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转变投资与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,尽快走向消费主导,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。

迟福林进一步提出,消费型社会的形成,必须建立在国民收入导向的基础上,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,“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,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可靠的保障,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都不会得到释放。”他认为,不仅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比例,还要完善再分配,教育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要均等化;税制、个税也应进行结构性调整;同时以公益性为目标,重新配置国有资本。通过“这些综合措施,再加上三个点左右的通货膨胀率,我想年均 15%的人均名义收入增长是有条件实现的。”

单不明确,现在到了需要创造条件尽快明确的时候了。比如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行政体制改革;再比如中央政府带头,尽快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,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尽快制定公布权力清单,有些地方率先实现负面清单管理;目前的竞争性地方政府要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回归。

迟福林认为,市场决定必将伴随着一场十分深刻的思想解放。市场决定意味着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,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、权利不等的历史终结,意味着官本位、权力寻租、经济特权的历史终结,对于市场主导下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、抑制消极腐败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,都具有决定性影响。

通过国际旅游岛最终走向自由贸易区。他设想,以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区进程,大致可以分三步走:第一步,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直接推动力,加快实行旅游产业的全面开放;第二步,在旅游产业全面开放的同时,加快推进与国际旅游岛直接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全面开放,例如,金融、电信、服务业等;第三步,在旅游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全面开放的基础上,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重点,在多方面实施投资、贸易、服务自由化政策,真正使海南成为开放之岛。

他还认为,海南作为岛屿,设立自由贸易区更便于管理,设立以后也有特殊的国际影响。但海南建立自由贸易区与上海相比,在经济基础、管理人才的积累方面还是差距明显。

城 观点摘录

收入要提低扩中限高

居民收入倍增不是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倍增,而是向城乡居民倾斜、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,是提低、扩中、限高,特别是限制垄断国企员工高收入、高福利。因此要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 GDP 增长;要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,确保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,使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从目前大约 40%提高到 50%左右;要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,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 2011 年的 3.13:1 下降到 2020 年的 2.8:1 以内。

我国不存在福利风险

欧债危机以来,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,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。我认为,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,远不是所谓的“高福利”问题。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,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。在这个特定背景下,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,不仅不存在“福利陷阱”的风险,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。

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

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,应该成为未来 8-10 年内的改革目标。可在 1-2 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,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,建立人口登记制度;3-5 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,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,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;5-8 年内,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。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、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。

政府权力清单需要尽快明确

如何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,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?迟福林认为,市场决定不是不要政府发挥作用,问题在于政府的作用应当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大前提。

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,迟福林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

■ 要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目标 把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,建立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;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,突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,以金融改革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转

型;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,突出财税体制在调节收入分配、拉动消费中的重大作用。

■ 从事前审批转为事后监管 前置性的审批过多过滥,既抑制了市场活力,又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以事后监管为主,克服市场失灵,形成微观规制的基本框架;并统筹考虑审批与监管体制改革,调整市场监管结构,把政府的市场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,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规范市场行为中的重要作用。

■ 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年剪不断理还乱,关键是政府权力清

今后自贸区将成为世界性潮流

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,扩大内陆沿边开放。对此,迟福林认为,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的背景下,尽快实现东盟-中国“10+1”自贸区升级版,不仅是我国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迫切需求,也是我国提高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和区域影响力的客观要求,对中国未来几年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,具有战略性、决定性的重大影响。他预测,“今后双边、多边自贸区会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,中国和东

盟的一些边境地区可能建立跨国自由贸易区,国内自由贸易区也会在上海自贸区试验的基础上增多起来。”

迟福林认为,上海自由贸易区与香港能达成双赢,“香港应该利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机遇,比如汇率改革、人民币可兑换方面,加快香港的发展;而上海则应该利用香港的经验,尤其在金融、服务贸易、物流方面,上海很大程度上需要向香港学习。”

迟福林说,海南是中国最早申请设立自由贸易区的,到现在海南也一直在努力,未来海南将